

怎样做好制止农村人口 盲目外流的工作

群 众 出 版 社

怎样做好制止农村人口 盲目外流的工作

内务部农村救济司 編

群 众 出 版 社

1 9 5 8 · 7

目 录

- 一 为什么要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 教育农村广大群众, 安心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… (5)
- 三 统筹安排生产和生活, 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… (12)
- 四 加强沿途劝阻工作…………… (17)
- 五 遣送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口返乡生产…………… (21)
- 六 加强对户口、物资供应和自由市场的管理…………… (26)
- 七 通过劳动部门统一调配和招收劳动力…………… (30)
- 八 共青团、妇联、工会等组织要和政府密切配合… (34)
- 九 妥善进行对回乡人员的安置工作…………… (39)
- 十 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奋斗…………… (42)

一 为什么要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

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，是一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。它关系到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，关系到工农联盟，关系到许多人的正常生活。几年来，经过各级人民政府在农村中大力进行宣传，劝阻人们不要盲目外流，在城市中动员盲目流入的人口还乡生产，特别是1957年下半年农村中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生产建设高潮，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现象，已经大大减少了。但是，这种现象还不可能一下就沒有了，我们还应把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当作一项重要工作。

最近，我们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确定了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，这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。我们广大农民应当为实现这条总路线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。积极搞好生产，不盲目到外地流动，对保证国家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是有很大作用的。

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57年12月18日发布了“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”，各地也都在认真进行这一工作，这是对农村和城市、对国家 and 人民都有很大好处的。

对农村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可以看到：盲目外流的人口中多数是青壮年，多数是农业战线上的主力军。拿1956年秋后至1957年夏收全国盲目外流的农村人口来说，其中青壮年占到60%以上。由于这些人放弃了农业生产，跑到城市和工

矿区去，农村中的劳动力必然减少，农业生产必然受到很大损失。有些地方由于劳动力外流过多，不能适时播种，不能精耕细作，以致影响了收成，甚至荒废了田地。如河北省武清县安标堡农业社，1957年春参加生产的人数由230人降为120人，劳动力减少了一半，使1,400亩麦田少锄了一遍，500亩春苗延误了开苗时间，副业生产更全部停顿了；该县相土屯农业社，因为有55个劳动力外出，留在村的人情绪低落，出勤人数一度下降90%，当时这个社有1,000多亩棉花需要开苗，500亩玉米需要锄二遍，50亩山芋等待栽秧，结果这些活都推迟了10多天。有些地方由于农业社的干部和骨干分子也都跑出去了，使工作无人领导，生产无人过问，严重影响了农业社的巩固。如1957年春河南省扶沟县外流农村人口13,445人，其中有农业社干部420人，党员217人，团员877人。青海省民和县大庄乡崔家湾社，有一生产队长外出后，16个队员接连几天没有下地；唐卡社副社长外出后，社员们说：“副主任都走了，我们还干什么呢？不如自想办法！”目前各地正在开展农业生产大跃进，为提前实现“全国农业发展纲要（第二次修正草案）”四十条而奋斗，如果全国所有农村都能教育广大群众安心农业生产，不再四出流动，使农业生产不断向前跃进，这样就会提前建成社会主义的新农村，使人们早日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，这难道不是我们全国农民长久的最大的利益吗？

对城市有什么好处呢？大批农民盲目流入城市，增多了消费人口，给城市带来了各方面的困难。首先是影响到对城市居民就业的安排。如广州市从1953年到1957年8月人口增加22万之多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农村人口盲目流入该市的。

其次是粮食、煤炭、副食品和日用品的消费量增加，造成了市场供应的紧张局面。如1957年河北省文安、大城、静海、武清等县，盲目流入天津市的农村人口达59,000多人，使天津市每月增加粮食供应量二千多万斤，突破国家规定的供应指标很多。再次是引起城市住宅、文化、卫生、交通等一系列的紧张情况。单就住宅一项来说，广州市由于人口的激增，五年来就在建房上投资一亿多元，比该市第一个五年计划头四年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还要多。特别是有些地主、富农、坏分子等乘机混入城市，逃避管制、监督，进行投机、造谣、破坏、盗窃等活动，严重地影响了城市的社会治安。据河南省扶沟县调查，1957年春盲目外流的人口中有地主283人，富农264人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246人。该省郑州市在遣返外流人口时，查获了一个携带短枪、军刀的大流氓分子安金彪；还查获了一个冒充农民、先后在北京、天津、徐州等城市骗取国家路费的大骗子乔津。如果各地能够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入城，已经入城的还乡生产，这样就会大大减轻国家对城市的负担，使城市更好地进行生产建设，加速工业化的实现，对发展农业生产作出更大的支援，同时，也使城市社会秩序更加良好。这难道对城乡人民不是都有很大利益吗？

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？除了以上所说的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给工农业生产建设造成的损失，直接关系整个国家利益外，在劝阻、遣送盲目外流人口的工作中，给国家造成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的消耗也是很大的。拿路费补助来说：据陕西省1957年统计，共遣返外省流入的农村人口189,000多人，国家补助路费达1,972,000多元，相当该省全年农村社会救济费（对贫困户的救济）的120%。拿交通运输来说：每年

成批遣送外流人口，鐵道部門都要在計劃之外調撥許多車皮，影響了建設器材物資的及時調運，使國家受到不少的損失。拿人力來說：每年為了勸阻、遣返盲目外流人口，都有大批幹部一連幾個月在勸阻站工作，還有不少幹部要遠地接送盲目外流人口還鄉，僅陝西省1957年27個市縣統計，投入這方面的幹部就有576人，其中有不少負責幹部放下了重要的工作，專門來搞這項工作。如果各地認真扭轉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現象，國家每年投入這方面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，就可節省下來，用於工農業生產建設事業。這對國家、對人民難道沒有很大利益嗎？

對個人有什麼好處呢？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結果，給他們自己也製造了不少痛苦和損失。有些人為了到城市找工作，不惜出賣財產，籌划路費，結果工作找不到，還弄得傾家蕩產，欠了很多債。如陝西省柞水縣紅岩寺鄉農民華定中全家八口人，外出時將所有家產變賣的一干二淨，到外鄉後，因無處安家，不到半個月就把隨身帶的錢全部花完了，最後只得求政府幫助；城關鄉農民劉定園將全部家產變賣了200多元，外出幾個月，找不到出路，只好返鄉，不但把200多元花光，回到家里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，過年時一個人孤獨地借宿在一間破窯里。有些人離鄉背井，在外人地兩生，沒有固定的住處，沒有安定的生活，受了不少的苦，甚至發生了不幸的事故。如河南、安徽等省盲目流入西安市的農民，因找不到工作，沿街乞討為生，住在郊區的破窯洞內，不幸因窯洞倒塌，壓死六人，並因燒火取暖，不慎燒死五人。特別是外流的人，在外漂蕩的結果，社里的工分落了空，秋收分配時，大家都分得很多，自己什麼也沒分到，造

成了生活困难。如浙江省嘉善县里澤乡农民陈金奎等三人，于1957年10月盲目到北京找工作，結果工作沒找到，农业工分也沒分到，还亏了一大笔債。河南省汝南县水电农业社1957年2月初到3月底，一般社員都作了20多个劳动日，折款十四、五元，农民聶振川春节后一直东奔西跑，一分未掙，做生意还亏了十几元，弄得生活没办法。如果各地不使农村人口盲目外流，将会减少許多人的痛苦，使他們过着正常的生活，这难道对广大农村群众不是有很大利益嗎？

由此可見，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，我們广大城乡基层干部，都应当以高度負責的精神，認真进行这项工作，使长期以来都沒有得到解决的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問題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。

二 教育农村广大羣众， 安心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設

农民盲目外流，大都是由于存在着“喜工厌农”、羨慕城市生活等錯誤思想而引起的。如果树立起社会主义的思想，就会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設，不会发生盲目外流；如果缺乏社会主义的觉悟，就会不安心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設，必然发生盲目外流。因此，加强对农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，結合全民整风大辯論，展开大爭大辯，使广大农民群众認清农业生产的重要性，乃是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重要关键。

在农村广大群众中，有那些錯誤思想需要批判呢？

第一、应当批判那种“喜工厌农”，認為农业生产“沒有出息”，“沒有前途”的思想。有的农民不認識农业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設中所占的重要地位，他們認為：“只有参加工业建設才是光荣的”，“种地、拾粪、拉大車、赶牲口是沒有出息的人干的，沒有什么发展前途”，因而产生了“喜工厌农”的思想，企图拋棄农业，到城市去做工。这种思想，在农村的一部分青年群众中表現得比較突出，有些中、小学毕业生和复員轉业軍人，也有这种思想。經過1957年下半年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大辯論以后，这种思想已經大大減少了，但还没有完全清除，需要繼續向农民反复进行教育。首先，我們應該清楚：干农业并不是“沒有出息”的，工人和农民的劳动都是光荣的，都是建設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。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方針，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。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，农业生产不仅是全国人民吃飯、穿衣的来源，而且也是工业发展的基础。农业充分发展了，工业的原料、市場和資金等問題便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。目前我国全部工业产值中，用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产值約占5%左右；农付产品和用农业原料制成的工业品，在国内市場的商品供应中約占9%左右，在出口总额中約占75%左右。这样看来，农业的发展，对国民經济有着重大的影响。沒有农业的发展，工业发展的速度就会降低下来，人民的生活就無法改善。既然农业生产这样重要，說是干农业“沒有出息”，难道不是极端錯誤的嗎？其次，我們也應該清楚：农业生产并不是“沒有前途”的，我国的农业生产不仅有前途，而且是大有前途。我們的国家，不光要在城市中建設社会主义，同时，要

在广大农村建設社会主义，使社会主义遍地开花。中共中央提出的“全国农业发展綱要（第二次修正草案）”，是发展农业生产和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偉大的綱領，目前全国人民正在努力提前实现这个綱領，爭取在三年內改变农村面貌。不光要在农村发展农业生产、发展多种經濟，还要在农村建立为农业服务的小型工厂，如化学肥料厂、农产品加工厂、农具修造厂等等，为实现农业机械化、电气化、科学化創造条件。这样看来，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設，前途是不可限量的。既然是这样，說是农业生产“沒有前途”，难道不也是极端錯誤的嗎？

第二、应当批判那种羨慕城市生活、貪图目前安逸的思想。有的农民对城市和农村、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差別，缺乏全面的認識。他們認為：“城乡生活水平悬殊太大”，因而有些人“身在田里，心在城里”。这种思想，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农民生活的改善，已有很大轉变，但在部分农民中仍然殘存着，特別是少数二流子、懶汉，好逸恶劳的思想尤其严重。我們对这种思想必須有正确的認識。首先，拿工人的劳动輕重來說，工人特别是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如炼鋼工人、采煤工人等，或在高热的爐旁，或在深深的矿坑，每天的劳动都很緊張，每年至少要做三百个以上的工作日，因此，他們的劳动是相当繁重的，和农民的劳动比較起来，并不輕松。再拿城乡之間和工农之間的生活水平來說，虽然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別，但并不是悬殊太大。当我們加以比較的时候，应当考虑到两者之間的历史情况和不同的生活条件。在旧中国，广大农民过着衣不蔽体、食不饱肚、糠菜半年粮的生活。解放以后，經過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，

农民的生活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。1956年农民的消费水平比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大约提高32.3%，比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（1952年）大约提高12.5%。如果只从货币收入来比较，当然目前职工和农民的消费水平还有一定差别。1956年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消费额为81元，职工每人每年平均消费额为179.6元，职工的消费额比农民高出一倍多。但是，我们都知道，农民的许多消费品，带着很大的自给性质，不用花钱；而职工的许多消费品，差不多都是商品性质，吃饭、吃菜、喝水、烧煤、住房、用电等等，都要花钱。在农村维持有吃有穿的生活，大约每人每月只要开支5元，在城市维持同等的生活就需开支10元。根据在湖南省攸县大兴农业社调查：社员李裕芳，全家六口人，全年消费的实物折款301元。以同样的实物折成北京的价格是728元，折成上海的价格是743元。这样看来，城市中的消费额的确比农村大的多，城乡之间目前的生活差别并不是太大的。总之，我国工人和农民目前的生活都还不算富裕，但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。中共中央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内，农业社集体经济的收入，加上社员家庭副业收入，按人口平均，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收入。事实上，全国有很多的农业社，已经实现了这个要求。今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大跃进，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迅速得到提高。那种叫喊农村太苦、羡慕城市生活的思想也是错误的。

第三、应当批判那种认为“城市好混”、就业容易的思想。有些农民听到一些传说，什么“城市里到处用人”啦，“随地都能找到事干”啦，“城市里赚现钱、农业社里记工分”啦，“混一天可以养活几口人”啦，等等。于是有些人

“听到风就是雨”，信以为真，千方百計的向城市里跑，梦想賺大錢，发洋財。其实这些傳說都是不可靠的，許多人因此吃了大亏。我們都知道：国家的經濟建設是按計劃进行的，不能随便添用劳动力。即使需要人，也要由劳动部門統一調配，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訂立用人合同，按合同办事，不能乱来。而且，目前大批干部向农村下放，大批中、小学毕业生輸送到农村，一些干部和軍官家屬也动員返乡，“下乡上山”支援农业战綫，农民自己反而向城市乱跑，这是很不應該的。江苏省的农民紀应富，过去不安心农业生产，跑到南京去找临时工，流浪了几个月，混不出吃来，这次看到很多老干部也下乡建設新农村，受到很大的感动，他說：“机关干部、大学生都下乡生产，我为什么要在城市里飄蕩？我本来是农民，建設新农村更有責任！”这个农民的話是正确的，所有企图盲目外流的农民都必須認識建設新农村的重大意义，扭轉不正确的想法。

第四、应当批判那种在灾荒面前悲观失望、逃避困难的思想。在灾害突然襲击下，往往有些农民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緒，灰心丧气，打算借逃荒躲避困难。有的社干部也丧失了信心，以为“穷家难当”，于是放棄領導，带头逃荒。因此，受灾地区更应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教育，迅速稳定群众的情緒，使他們保持高昂的干劲，搞好灾区的生产，不要盲目外流。最主要的是，必須使每个人都看到我們战胜灾荒的有利条件：

（一）我們有农业社的优越力量。农业社里，人是有組織的，財力、物力是集中的，因此能够在紧急情况下，搶救受灾的农作物，进行补种、改种，爭取“受灾不減产”或

“減产不減收”；而且也能够統一掌握和使用各种經濟力量，加速經營，扩大再生产，創造渡荒和农业基本建設的物質条件，爭取“消灭当年的灾”，又“防备以后的灾”。只要我們在农业社統一领导下，积极想办法，开展生产大跃进，灾害带来的暂时困难，是完全可以克服的。如果看不到农业社的这些优越条件，受灾后失去信心，抛开农业社，盲目出去逃荒，那么就会招来更大的困难，正如有些灾区群众說的：“誰离开了社，誰就象树离开了根。”

（二）我們有广大非灾区人民的支援。我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形成了一个团結友爱的大家庭，不論那个地区受灾，其他地区的群众，都会当作自己的灾难，热情地給予帮助。因此，我們受灾以后，并不是孤立的，我們有广大非灾区人民的支援，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。如果看不到在我們国家里这种社会主义的互助关系，受灾以后就悲觀失望，到外地去逃荒，那么不但逃到那里，給那里增加困难，而且自己的生活也無保証。

（三）我們有党和政府的領導和支持。在旧社会里，人民受了灾，統治階級不但不救灾，反而趁机加紧剝削，貪污捐款，大发“灾荒財”，因之灾区人民只好卖兒卖女，或者逃荒要飯。1918年到1920年，西北大旱灾，据国民党陝西省伪賑务委员会調查：37县就有100多万妇女离开了本乡，其中逃荒的70多万，被販卖的30多万；加上男子，則全省离乡的达200万人左右，占全省人口六分之一，这是多么駭人听闻的事！今天的情况大不同了，党和政府对灾区群众無限关心，各級干部和群众在一起，同甘苦、共患难，出主意、想办法，积极开展生产，坚决和灾荒作斗争！在困

难一时無法克服的时候，国家还撥出大量款項和物資，支援受灾群众。这样看来，某些灾区干部、群众的悲观失望情緒是不應該的，逃荒躲避困难也是完全錯誤的。

教育农民安心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設，是一項复杂細致的工作，各个乡、社应当把它当作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內容，发动群众展开大辯論，用摆事实、講道理、算細賬以及回忆对比等办法，帮助大家認明是非、分清利害、提高觉悟、打通思想。山东省蒼山县蘆塘乡，1957年遭受了水、旱灾害，秋季減产83%，群众情緒普遍不安，全乡816戶中，十月初准备外流的就有242戶。乡的党总支，针对这种情况，首先召开了总支委员会，学习了有关生产救灾的政策指示，統一了党员的思想認識，然后召开全体社員大会，进行勤儉办社、勤儉持家和生产自救的教育，說明外流的害处：第一、社員外流，全乡将有7,000亩小麦种不上，来年的日子更难过；第二、社員外流，一戶最低少积70筐糞，对生产不利，也減少了社員收入；第三、跑到外地，給当地增加麻煩，自己的生活也無保証。經過这番教育，又发动大家展开爭辯討論，最后社員們一致認識到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門时时难”，“一逃三荒、越逃越荒”；只有积极开展生产，才是战胜灾荒的根本办法。会后党总支又进行了“全面规划、逐戶安排”，社員們的情緒迅速稳定下来，积极参加了冬季生产，沒有一戶外流的。这一事实說明了：只要思想工作做得好，农民的思想就能很快扭轉过来，重新鼓起生产干劲，打消外流的念头。

三 統籌安排生产和生活， 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

农民盲目外流的另一个原因，是还没有把每个农民的力量妥善組織到生产中去，还没有調动起每个农民的积极性，共同为建設新农村而奋斗。由于生产安排的不妥善，有些农民觉得没有什么搞头，于是就想离开农村，到城市中去別寻出路。因此，积极从生产上打主意，开展生产大跃进，把所有的农民都妥善地組織到生产中去，也是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一个重要措施。同时，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，广大群众也就打消了外流的念头。

农业合作化的实现，为农村劳动力的运用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，把每一个农民合理的安排到生产中去，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，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自1957年下半年农村中开展了社会主义大辯論，农业生产开始了空前的大跃进以来，各地接連不断地突破生产指标，一次又一次地修改生产計劃，所有这些都証明农业經濟有很大的潜在力量，农村的生产建設是大有搞头的。有些人認為：我国农业經濟的特点是人多地少，劳动力过剩，农业合作化以后，劳动力过剩的現象就会变得更加突出，这是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一个基本原因。其实，这些人的想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。毛主席早就指出：“在許多地方，合作化的实践，打破了人們的这种顧虑，劳动力不是过剩，而是不足。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，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，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規模，还没有

进行多种經營，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緣故。对于很多地方說来，生产的規模大了，經營的部門多了，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深度擴張了，工作做得精致了，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。”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）现在农村就已经发生因为人手不足，有些事干不过来的现象。“全国农业发展纲要（第二次修正草案）”四十条，每一条都是要人做的，都实行起来，劳动力就需要很多，人畜不足、忙不过来的情况会越来越多，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：“这种情形，现在只是在开始，将来会一年年地发展起来，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。”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）根据这种情况，难道还愁农村中劳动力过剩，还愁有人没活干嗎？因此，那种认为农村中无法容纳过剩劳力，以致放任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现象是完全错误的。

通过安排生产，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，不论在自然条件好的或坏的地区都是可以办到的。有些人认为：在他们那里，自然条件不好，穷山恶水，土地瘠薄，发展生产困难很多，农民外流是一种历史习惯和自然趋势，是无法制止的。其实，这些人的看法是错误的，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。我们看到：不少贫瘠地区，正因为他们那里自然条件不好，干部、群众更加鼓起革命干劲，下定改造自然的决心，千方百计地寻找适合当地条件的增产办法，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，终于战胜了穷山恶水，改变了贫困面貌，也就彻底消灭了群众缺吃少穿和每年都有大量人口盲目外流的现象。比如河南省济源县北靠太行山、南滨黄河，境内还有蟒河，是经常闹灾的穷地方，这里的农民曾经贫困到这样的程度：不但在灾年，就是在平常年景，人们也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，正如农

民所形容的：“早上糠，中午湯，晚上稀飯照月亮。”農民們被迫大批外流的現象，每年都有發生。但是，在人民作了主人的時代，是不能讓這種貧困局面長期保持下去的。自1952年起，濟源縣領導機關就開始重視改變自然面貌的工作。1955年高級合作化和“全國農業發展綱要（草案）”公布以後，濟源縣更制訂了改變自然面貌的全面規劃，領導全县人民進行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和水土保持工作，擴大了耕地面積，增多了水澆地及水田，控制了絕大部分流域面積，獲得了連續四年的豐收。同1949年相比，1956年糧食單位面積產量由94斤增加到168.4斤；總產量由6,638萬斤增加到19,778萬斤；每人平均占有糧食由227.4斤增加到698斤；全县農業社有91.8%的社員增加了收入，徹底改變了人們半飢半飽的生活狀況，歷年農民大批外流的現象得到了根本制止。濟源縣能夠辦到的事，其他貧瘠地區同樣是可以辦到的。

通過安排生產，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，不僅在一般農村，就是在受災農村也是可以辦到的。有些人認為：在他們那里，受了嚴重的災害，莊稼沒有收，口糧沒有分够，群眾的生活難以維持，農民外流是不可避免的。其實，這些人的看法也是錯誤的，是一種消極畏難情緒。我們看到：不少災區，災害雖然打亂了原來的生產秩序，但他們仍然保持高昂的革命幹勁，再接再厲地向災荒作鬥爭，積極擴大再生產，彌補受災損失，經過短短幾個月的努力，終於戰勝了災荒，不僅保證了群眾有吃、有穿，生活安定，而且和非災區一樣掀起了生產建設的高潮，沒有一戶農民盲目外流。比如山西省平順縣金星農林牧生產合作社，1956年秋季，莊稼長的本來挺好，突然遭受了冰雹、暴風、雨澇等災害，據估計